闲读抄

可写成座右铭

周克希

孙犁先生在《读〈史记〉记》(收入《耕堂读书记》)中提到,与司马迁并称“班马”的东汉史学家班固,曾这样评价司马迁:“然自刘向、扬雄博极群书,皆称迁有良史之才,服其善序事理,辩而不华,质而不俚,其文直,其事核,不虚美,不隐恶,故谓之实录。”

孙先生说:事理本不可分。有什么理,就会叙出什么事;叙什么事,就是为说明什么理。

辩而不华,质而不俚,是很难做到的,要有多方面的深厚的修养。因为既辩,就容易流于诡;质,就容易流于俗。辩,是一种感情冲动,易失去理智;文章只求通“俗”哗众,就必然流于俚俗了。

至于文直、事核、不虚美、不隐恶,“就更非一般文人所能做到,因为这常常涉及许多现实问题:作家的荣辱、贫富、显晦,甚至生死大事。所以这样的文章、著述,在历史上就一定成为凤毛麟角,百年或千年不遇的东西了。”

他“奉劝有志于此的同道们,把班固的这三十个字,写成座右铭。”(他说的“这三十个字”,我想就是指“有良史之才,善序事理,辩而不华,……不隐恶”,三十一个字。)

他说:“希望当代文士们,以这三十个字为尺度,衡量一下自己写的文字:有多少是直的,是可以核实的,是没有虚美的,是没有隐恶的。然而,这又都是呆话。不直,可立致青紫;不实,可为名人;虚美,可得好处;隐恶,可保平安。反之,则常常不堪设想。班固和司马迁,本身的命运,就证实了这一点。”

这一段文字,写得痛快淋漓。于孙犁先生,这想必是有感而发。

我则衡量了一下这个“闲读抄”。一个小小的专栏,固然还谈不上虚美或隐恶,但是我想,至少也应该以孙先生在文章稍后处提到的“不痛不痒”为戒,别有一搭没一搭地写个没完。读读抄抄,已近一年——请允许我在此感谢读者朋友的耐心和宽容。

端午时节的粽箬

刘香河

故乡多芦荡。

最常见的,为河柴和盐柴两种,以河柴为最多。偶或在河柴之中,生出一小片盐柴来,颇为惹眼。因为河柴的秆儿过细,叶儿狭窄,而盐柴则不同,秆儿粗壮挺拔,叶儿阔,且长,有股子柔劲、韧劲。从介绍中,便不难分辨,将来被打了去裹粽子的,肯定是后一种,盐柴上的苇叶儿,真正“粽箬”是也。

粽箬,天生是和一个节日拴在一起的。那便是“端午节”。因为“端午节”,这粽箬才有了用武之地:裹粽子。

汪曾祺先生在他散文《端午的鸭蛋》中,有这样的描述:“喝雄黄酒。用酒和的雄黄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,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。”与“雄黄酒”相配的,当天中午的菜品也有讲究,需“五红”“五黄”。“五红”通常是烤鸭、苋菜、红油鸭蛋、龙虾、雄黄酒;五黄分别是烧黄鱼、烧黄鳝、拌黄瓜、咸蛋黄、雄黄酒。据说端午节吃了这“五红”“五黄”,整个夏天便可驱五毒、避酷暑。凡此等等,不再细述。这当中,有一样重要食品:粽子。

唐代诗人元稹“彩缕碧筠粽,香粳白玉团”之句,状写的是粽子的形状和味道。同样是唐代,温庭筠的“盘斗九子粽,瓯擎五云浆”则描绘了粽子的大小和品质。宋代陆游的“盘中共解青菰粽,哀甚将簪艾一枝”,道出了那时已有“以艾叶浸米裹之”的“艾香粽子”。大文豪苏东坡,尤喜食粽,品尝了馅中藏有蜜饯的粽子之后,留下了“时于粽里得杨梅”的诗句。清代林苏门的“一串穿成粽,名传角黍通。豚蒸和粳米,白腻透纤红。细箬轻轻裹,浓香粒粒融。兰江腌酺贵,知味易牙同。”则写尽了火腿肉粽之妙。

故乡上好的粽箬,大多生长在肥沃的湖荡里。这样的湖荡,我们多半直呼之为:“芦苇荡”。因芦苇繁盛之故,完全忽略了其他物种之存在。

五月端午节前,便有姑娘媳妇,三三两两,划了小船到荡子里来打粽箬。碰上了肥美的粽箬,这些姑娘媳妇会开心一整天呢。

粽箬从芦苇秆上打下之后,需一把一把地,扎好,放到箩筐里,之后,到城里街上去卖。在家乡,卖粽箬,多是女子所为,且不是一人独做。而是三五个甚至十来个女人,搭成帮,荡了小木船进城。

卖粽箬,有这般沿街叫卖的,亦有摆地摊卖的。粽箬装在一只小木盆里,木盆旁边备个小水桶,卖主适时给粽箬洒些水,那粽箬看上去水灵灵的,青滴滴的,难怪女人干这营生才相宜呢。

地摊上,除了卖粽箬的,还有卖艾的,卖菖蒲的,也有卖红萝卜的。长长的一条龙摆下来,占满了整个巷子,听凭过往客人挑选。要想买粽箬的话,花几分钱便能买到一把了。寻常人家三五把粽箬,过个端午节,便足够了。

冬去春来,四季轮回,那芦苇在荡子里,黄了绿,绿了黄,顺乎天然。偶或需要时,进得荡去,或打些苇叶,或割些柴草。住在荡边的人家,每年端午节落得一大片好苇叶,秋季落得一大片好柴草,倒也叫人眼馋。

粽箬,长于湖荡,从没施化肥之说,自然天成。这打下的粽箬,便随即上市,满身鲜活之气,一经烫出,既翠,且柔。在女人手指间缠绕几下,之后,便会翻出多种花样:菱角粽,小脚粽,斧头粽……上锅用木炭火蒸煮,几个时辰之后,便可揭锅,出粽。那粽子,出得汤来,清香盈面,青翠逼眼,叫人垂涎。

离开故乡,在外地城里做事,每日路过的小巷上,再难见到三五成群的女子,挑着卖粽箬的担子,一溜儿软软的步子,还有那甜甜的叫卖:

“卖——粽箬咯——”

水乡客厅(水彩) 吴国兴

隐山

王江江

近年多访树,而古树又多在秦岭。

从西安向秦岭南麓出发,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,一路所见皆是溪水环绕、树木茂密之景。人在路途,思想随着颠簸的车辆瞬息跃动,望着远山凝云,往事俱在天地间浮现。

恍惚中又想起初上终南山的片段。终南山位于西安市长安区,是莽莽秦岭的一部分。时有一友在此求学,邀约同行。从后山的太乙镇出发,一路上行。渐行人烟渐稀,远处是云海叠嶂,松涛阵阵,一路清泉伴着鸟鸣。虽还未到山口,但沿路零星可见隐居者房屋。

我在一隐者屋处驻足歇息。屋子突兀建在山间,没有围墙,没有院门。布置极为简陋,墙壁上已是斑驳的时间印记。一进屋,挂着一幅松鹤图,纸张已有些发霉,四面的墙壁亦是如此。抬头可见阳光从稀疏的缝隙间洒进来。

屋内所住是一对老夫妻,老妇上山给顶峰的寺庙送物品。屋主人拿给我他们的食物——水和白饼。白饼烙出时应该很大,现已被裁成小块的长方形。虽小,却结实。吃完一块后,辞别他们继续往更高更深处行走。

伴随着阵阵蝉鸣,我穿梭在各样小径斜阶之间,感受着蝉噪林静、鸟鸣山幽的意境。雨后的樱花落满山路,不忍踏之。山间道观佛堂并不冲突,山石上时见信徒手书的佛字。在半山腰还碰到山下那位老妇返程,她面容似童颜,看不出忧虑的痕迹。山中三三两两有隐居者的屋篷,大部分在门上悬着“止步”字样。滚滚红尘就这样被阻挡在千里之外。

突然想起《秦岭记》里的片段:黄伯岔的王卯生在星罗峡打猎,被一头麝顶落崖下。而在西津渡开饭馆的梁双泉要扩大店面,去上游十五里的星罗峡砍竹子。砍了竹子才结好排,发现草窝里的王卯生。王卯生昏迷不醒,一条腿折了。梁双泉试了试口鼻,尚有气息,说:“我咋摊上这事!”说罢便将王卯生背上竹排,带回西津渡疗伤。

“我咋摊上这事!”作为山下之人,生命里我们有太多这样的时刻,但最终都还是扛起它前行。

从同济的咖啡说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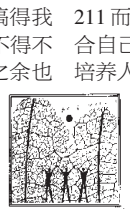
张生

如果我说上海最文艺的大学是同济,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惊讶,可一旦你了解了同济这所大学的传统和校园的氛围,也许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惊讶了。

说同济文艺,可能大家会首先想到樱花。同济的樱花在上海的大学里也是首屈一指,每年春天樱花盛开的季节,到同济来看樱花已经成了上海的一大盛事。但樱花开得快谢得也快,我觉得,真正一年四季让同济有文艺气息的还是学校里的各式各样的咖啡馆。

如今很多大学里都有咖啡馆了,可是将近二十年前,我从交大调到同济来没几天就发现,同济几乎每一座大楼里都有一个咖啡馆,而且是那种真正的有意式咖啡机的咖啡馆。那时交大校园里还没有咖啡馆,如果要喝咖啡,只能喝热水冲泡的三合一的雀巢咖啡,但是在同济,十块钱就可以喝一杯Espresso,而那时外面只有星巴克才有。这当然与同济最早是德国人办的大学,而且从建立开始,就一直与德国保持密切的联系有关。除了特殊时期,同济的第一外语长期以来都是德语,而不是别的大学通行的英语;而同济的老师,海外交流或者攻读学位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德国或者欧洲的学校,因此同济的校园里始终有一种德国的和欧洲的文化气氛。因此,我说同济是上海最文艺,也是最有松弛感的大学都不为过。

不过,有时在同济喝咖啡也难免不是那么松弛。有次一个同事带我去中德中心楼上的咖啡馆喝咖啡,墙上的装饰全是日本的色彩艳丽的浮世绘,搞得我的眼睛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才好。不得不说,在这里喝咖啡让人眼界大开之余也难免大吃了一惊,我甚至当时感觉咖啡的味道都变浓了不少,一杯espresso喝出了两杯的效果。



而且,同济的本部四平路的校园建筑粗看貌不惊人,可是却错落有致,建筑物之间的尺度不是很大,很适合随意在校园里漫步。在同济校园里几乎随时可以找到可以坐一坐的地方,树荫下是圆形的石桌和石凳,很多楼宇前有木头的桌椅,河边也有像酒吧的高凳和小桌。更加别致的是,一进大学校门,主路的两侧就摆放着带有花坛的木质连椅。我经常坐在鲜花丛中闻着香味沉思,有时和路过的同事坐下来一起聊上几分钟,或者对着来往的行人微笑,等候校门外即将驶来的公交车。而每到这一刻,我都觉得无比放松和惬意。

当然,说同济很文艺还与学校的学科结构有关,因为同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以建筑土木的系科为主,现在的设计学科也是分量很大,所以尽管还有其他工科的学科,但是“存在感”并不强,所以很有文艺色彩的建筑学科还是深深影响了学校的文化气氛。不说别的,我发现搞建筑和设计的老师都很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,他们大都衣冠楚楚,文质彬彬。而且,就像搞IT的人都有一套乔布斯风格的牛仔裤T恤衫一样,搞建筑的也有自己的穿衣code,特别明显的就是他们一年四季都喜欢围个围巾,戴个略显“过时”的黑色圆框眼镜。真正“懂”他们的人都知道,这个眼镜其实是现代建筑大师柯布西耶的专属眼镜,早已在建筑师中风靡一时,成为标配。不说别人,就说最著名的华裔建筑师贝聿铭,他戴的也就是这么一副柯布西耶式眼镜。所以这个眼镜几乎成了建筑城规学院的“院镜”。有的老师我怀疑是假近视,可也戴着柯布西耶的黑色圆框眼镜,让人感觉到一种浓烈的山寨建筑家的气息。而他们的学生也纷纷东施效颦,虽然还是个建筑学徒工,也都把自己打扮得很艺术化,所以他们在有形无形中也加深了同济的文艺气氛。

其实,我也很想戴一副这样的眼镜,因为这种眼镜也是我的偶像萨特的眼镜经典款。

话又岔开去,很多年以前,或者更早以前每个大学都像同济一样有着自己的风格,它们都有不同的个性,虽然没有同济这么多的咖啡馆,可也一样有自己专属的校园文化。尽管那时还没有985、211的名头,可不同的学校也都能吸引到不同的学生,造就不同的人才。可这些年来,很多学生只为了考个985、211而拼命,而不是考虑哪所大学更适合自己;也有些办学的人不是在为国家培养人才,为推动学术研究的进步,为追求真理来办学,而是变成了为排行榜办学,为A、B、C的学科排名办学。所以有的学校干脆把不能脱C的学科关掉而后快,而不考虑这些学科是否对学校的学科生态和培养学生有利;或者直接追逐市场的热点办学校,就像前几年元宇宙吃香,有的学校把整个学院都改成元宇宙学院,而今天人工智能吃香,又恨不得把学校所有的学科变成人工智能专业一样。

其实,这些都是短视的行为,因为这不是在办大学,而是在办学科竞赛培训班和职业培训学校。大学的使命是为国家的建设和学术的发展培养人才,不能只为了现实的短期的需求而办,还应该为了将来的发展而办。而且教育管理者也应该尊重和发扬每个大学自己的传统和文化,只有这样,培养出的人才会有着不同的特点,也只有这样,才能真正有益于不同性格和禀赋的学生的发展,才能真正有益于文化的丰富、思想的创新、科学的进展。

在国际仲裁领域逐梦前行

李旻

在当今全球化的商业环境下,国际仲裁已成为跨境商事争议解决的核心方式。我和我的团队长期代理各类商事仲裁案件,涉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(CIETAC)、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(SHIAC)、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(SIAC)、香港国际仲裁中心(HKIAC)等众多权威仲裁机构。

在我看来,踏上国际仲裁之路的首要任务是“破”,即打破固有的知识体系与思维定式,主动走出舒适圈,积极拥抱多元的法律世界。2013年,我在英国Curwens律所的实习经历,至今仍历历在目,让我深刻领略到国外律师独特的工作风格与节奏。2023年,经过层层严格选拔,我从上海4.5万余名律师中脱颖而出,以队长身份入选“沪新两地律师交流项目”首批成员,在新加坡开启了为期三个月的沉浸式学习之旅。这段经历让我收获颇丰。在新加坡,我与多家顶尖律所展开深入交流,深度参与他们在SIAC与ICC框架下的仲裁案件工作,学习其先进的案件管理机制、高效的证据整理方法以及完善的客户沟通体系。通过实践,我深切感受到普通法系下对“案件准备”的极致精细要求,也直观认识到国际律所在“法律写作”与“策略推演”方面的高度重视。

2024年,我前往泰国,参加由英国知名机构ADR ODR International和泰国仲裁中心(THAC)联合举办的国际调解员培训,并顺利通过认证考试,获得国际调解员资格。

这些经历带来的不仅是业务能力的提升,更重要的是视野的极大拓展。我深刻认识到,一名真正的国际仲裁律师,不能仅仅满足于精通英文和出国开庭,更需要在认知层面实现彻底“重塑”:要深入理解英美国家的司法文化,熟悉其仲裁规则对程序正义的极致追求,掌握在以普通法为基础的仲裁环境中说服仲裁庭、赢得信任的技巧。

这份“破”的勇气与能力,无法通过一次培训或一次认证轻易获得,而是需要在大量的实战历练与持续的跨文化学习中逐步积累形成。我将这些宝贵经验带回团队,通过模拟仲裁庭、案件复盘会等形式,助力年轻同事快速突破专业瓶颈,走向更广阔的职业舞台。

“破”而后立,在国际仲裁的征程中,“立”更为关键。涉外律师不能局限于成为“法律专家”,更应努力成为“商业理解者”和“文化翻译者”。在跨境纠纷中,客户关注的往往并非单纯的胜诉结果,而是“这场官司是否值得打”“投入多少成本能解决问题”“会不会面临对手冻结全球账户的风险”等实际问题。因此,我们既要熟练运用《纽约公约》《UNCITRAL规则》等国际法工具构建执行路径,又要深入了解客户所在行业的规则、供应链结构以及交易习惯。

在代理一起跨国欺诈仲裁案件时,我带领团队深入研究当地合同法、外汇管制制度,并引入独立专家意见,为仲裁庭全面、准确地还原案件背景事实,最终帮助客户实现风险最小化,并成功回收部分资产。这些实践让我深刻体会到,“专业”不仅是知识的储备,更是一种能力——运用专业的法律语言,将客户的商业目标最大化实现。

日前,我有幸入选上海市司法局首届“涉外鼎新人才库”,这既是对我过往努力的认可,更是一份激励,推动我在新时代涉外法律服务的浪潮中不断探索,勇拓新境。

十日谈

一名焊接技术人员,如何“千锤百炼”,成为了国际仲裁员。

法治护航“一带一路”

责编:刘 芳